

陆陇其的独尊朱子论*

——兼谈其对东林以及蕺山、夏峰等学派的评定

张天杰

内容摘要: 陆陇其是清初程朱理学一系的代表人物,其学术主旨是“尊朱辟王”。与对其有影响的张履祥、吕留良、熊赐履等学者相比,陆陇其明辨道统,形成了更为完整而独特的“独尊朱子”论。一则辨析为何朱子之学即孔子之学、尊朱子即尊孔子,一则辨析为何顾宪成、高攀龙与黄宗羲、孙奇逢等调停朱、王之不可取。正是因为他的深辟与严辨,从而在“由王返朱”思潮,也即朱子学再度意识形态化过程中发挥了较大的“卫道”之功。

关键词: 陆陇其 清初儒学 独尊朱子 由王返朱 东林学派

自宋以降,程朱、陆王之争时隐时现,成为宋、元、明、清儒学史的一条主线。晚明的东林、蕺山两大学派都有一定程度的“由王返朱”,然尚不彻底。梁启超说“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约三四十年间,完全是前明遗老支配学界。他们所努力者,对于王学实行革命。”“王学反动,其第一步则返于程朱。”^①推尊朱子的运动,到了清初则逐渐形成大趋势,由民间发轫,再与官方互动而制度化、意识形态化,康熙五十一年(1712)将朱子从祀孔庙的地位加以升格,则可以看作“独尊朱子”的标志性事件。“宋儒朱子配享孔庙,本在东庑先贤之列,今应遵旨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②

对于地位尊崇的清初朱子学,学界却一直比较冷漠。陈荣捷先生早已有注意“大多史家,均以程朱学派为钦定正统,而不以此派有其重要性。”^③钱穆与冯友兰置此段程朱学派于不顾,梁启超仅提及少数程朱派儒者,张君勱、蒋维乔以及日本的森本竹城之等等,都是因为理学被朴学所取代而认为此一阶段仅为过渡期,故几无讨论之价值。因此,陈先生还指出“诸学者中,从无一人视程朱运动有何积极之贡献。此实一严重之疏失,不仅曲解程朱学派之真象,亦曲解十七世纪一般中国思想之真象。”事实上,十七世纪的程朱学派自有其独立之价值,在儒学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意义也值得作进一步的探析,而其中的最关键一环,即朱子学何以成为独尊,就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陆陇其(1630-1693),原名龙其,字稼书,谥清献,浙江平湖人,曾任嘉定知县、灵寿知县、四川道御史。他是清初的理学名臣,在康熙朝被称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④,到了雍正朝又成为第一个从祀孔庙的本朝学者。作为一个中下层官员,之所受到清廷的诸多礼遇,就是因为他在“卫道”上的突出贡献,特别是通过著作的刊行与学术论辩等,将民间学者的“尊朱辟王”思想加以发展并传播于官方学者之间,从而

*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刘宗周大传与年谱长编”(20BZX079)的阶段性成果。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二章、第九章,《梁启超全集》第十二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26、397页。

②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四九,《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466-467页。

③ 陈荣捷《〈性理精义〉与十七世纪之程朱学派》,载《朱学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9-272页。

④ 吴光酉《陆稼书先生年谱》卷首,《陆陇其全集》第十三册,中华书局,2020年,第1页。

推动了朱子学的“独尊”。所以说,以陆陇其为研究中心来看清初学者的“独尊朱子”论,对于研究十七世纪的儒学史有着重要的意义。^①

—

清初朱子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当是民间与官方共同推动,或者说是他们共同所愿,虽然其目的有异有同,其异一在反思明亡,一在重建官方意识形态;其同则在端正风俗、人心,整顿社会秩序。后来成为官方学者的陆陇其对于朱子的推崇,究其思想之来源则是受到民间的、前明之遗民学者张履祥(1611-1674)、吕留良(1629-1683)的影响。就“独尊朱子”而言,关于为何“独尊”、如何“独尊”等问题,则陆比张、吕二人论述更加具体、详实。

陆陇其认为朱子之学即孔子之学,尊朱子即尊孔子。为什么是朱子?在阐明朱子在儒学史上的重要性之时,他有两个重要论断:其一,在孔子与朱子之间,还有北宋诸儒作为中介,而朱子则是集诸儒之大成;其二,朱子之所以当独尊,则是因为其“所述诸经之传注”,“去今未远,遗文具在”:

《六经》未作,道在天地;《六经》既作,道在《六经》。自尧、舜以来,众圣人互相阐发,至孔子而大备。……然汉儒多求详于器数,而阔略于义理,圣人之遗言虽赖以传,而圣人之精微亦由之而湮。历唐及宋,至濂、洛、关、闽诸儒出,即器数而得义理,由汉儒而上溯洙泗。

自尧、舜而后,群圣辈出,集群圣之大成者,孔子也。自秦、汉而后,诸儒辈出,集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朱子之学,即孔子之学。(《经学》,《三鱼堂外集》卷四,《陆陇其全集》第二册,第461-463页)从孔子到朱子这一道统传承的逻辑,在陆陇其那里有着非常详尽的论述,特别是作为中间一环的北宋诸子,他也给予了特别的重视:

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犹文、武、周公损益二代之制,以成一王之法也。孔子伤夏、殷之礼不足征,盖惜文、武、周公损益之妙,不得见于后世耳。今孔子之道虽垂于《六经》,而其所以损益群圣者,后世亦不能知其详。独朱子去今未远,遗文具在。其所述诸经之传注,既足以明道于天下,而其损益之妙,又往往见于《文集》《语类》之中,学者其可不宝而传焉。(《松阳钞存》卷下,《陆陇其全集》第十册,第328页)

他还说“非周、程、张、邵,则洙泗之学不明,非朱子则周、程、张、邵之学不明……尊朱子,即所以尊周、程、张、邵,即所以尊孔子。”(《道统》,《三鱼堂外集》卷四,《陆陇其全集》第二册,第466页)孔子集文、武、周公等群圣之大成,朱子则集北宋濂、洛、关、闽等诸儒之大成,故推尊朱子就等于推尊周、程、张、邵诸儒,也就等于推尊孔子。进而言之,因为汉儒“详于器数”而“略于义理”,故仅仅传下了圣人之遗言的《六经》,圣人之道之精微却被湮灭,后世难以通晓孔子损益的文、武、周公、三代之制的详细节目;然而经过了周、程、张、邵诸儒对孔子洙泗之学的发明,再经过朱子,则圣人之言的精微得以彰显,于是乎“明道于天下”了。而且朱子还留下了详细的“诸经传注”以及《文集》与《语类》,他是如何评判、抉择周、程、张、邵之学,也即其中的“损益之妙”也可得而知之,“去今未远”的朱子遗文则为后世学者明道、传道提供了方便。

在阐明了为什么必须“独尊”朱子之后,还要阐明如何“独尊”朱子。陆陇其指出,当于学术混淆弊病滋生的明清之际,唯有“独尊”朱子(紫阳,“今日起敝扶衰,惟在力尊紫阳”(《答秦定叟书》,《三鱼堂文集》卷五,《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136页)这种“独尊”的意识,在清初诸儒之中表现最为突出,而

^① 关于陆陇其的学术渊源,参见拙作《从张履祥、吕留良到陆陇其——清初“尊朱辟王”思潮中一条主线》,《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2期。学界相关研究值得注意的有陈来《陆陇其的实学思想》,载陈鼓应等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下卷),齐鲁书社,1990年;林国标《清初朱子学研究》第五章第一节,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对于陆陇其的“独尊朱子”论相关研究停留在指出其“尊朱”的宗旨,而对“尊朱”的思想来源、具体特点等问题都还语焉不详。

且也是论证最为详实的。他说:

尝以为近世学术之弊,起于不能谨守考亭,故救弊之法无他,亦惟有力尊考亭耳。……夫朱子之学,孔孟之门户也。学孔孟而不由朱子,是入室而不由户也。(陆陇其《答嘉善李子乔书》,《三鱼堂文集》卷五,《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111-113页)

今之学者,必尊朱子而黜阳明,然后是非明而学术一,人心可正,风俗可淳。阳明之学不熄,则朱子之学不尊。(《上汤潜庵先生书》,《三鱼堂文集》卷五,《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115页)

所谓“近世”当指中晚明以来,因为阳明之学的兴盛,以至于学者们不能谨守朱子(考亭)之学,于是弊病丛生。故而想要“起弊扶衰”则必须“罢黜阳明,独尊朱子”,使得“是非明而学术一”,于是人心可以端正、风俗可以淳朴。也就是说,朱子之学是通往孔、孟圣人之学的唯一孔道,故阳明、朱子二学,在陆陇其那里已经势同水火,不可并存了。进一步又说:

今之论学者无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者为正学,不宗朱子者即非正学。汉儒不云乎,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之学者,亦当绝其道,勿使并进,朱子之学尊,而孔子之道明,学者庶乎知所从矣。(《经学》,《三鱼堂外集》卷四,《陆陇其全集》第二册,第464页)

既然“朱子之子即孔子之学”,“朱子之学尊,而孔子之道明”,那么学者也就必须“宗朱子”,“宗朱子”才是“正学”。陆陇其还提出效仿汉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如今则“非朱子之说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值得注意的是,陆陇其还有更为严苛的主张,以及更为具体的“独尊朱子”的措施,他说:

汉之世,当尊孔子,而今之世,当尊朱子。……尊朱子,而非朱子之说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四书》《五经》之注,固学者所当奉以为式,不敢稍叛矣;而凡《太极图》《通书》《东西铭》《皇极经世》诸书,为朱子所表章者,皆列于学宫,俾学者肄而习之。而又选敦厚有道术者,为之师表。使之惟诵其言,且法其行。如是则天下晓然知宋儒之学,为天下之正学,为洙泗之真传。(《道统》,《三鱼堂外集》卷四,《陆陇其全集》第二册,第466-467页)

一方面,陆陇其要讲明如何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一是确立新的经典,朱子注释的《四书》《五经》必当奉为经典,朱子表彰的北宋诸子之书也当奉为经典;二是遴选“敦厚而有道术者”作为老师,也就是说能够笃实讲明并实践朱子之学者方才可以作为学宫之师。另一方面,还要禁绝似是而非之学,不但要将“不宗朱子之学者”“绝其道”,还要将“尊朱子,而非朱子之说者”也“绝其道”,也就是说表面上表示尊崇朱子之学,而实际并非真正从事朱子之学者,也都要将之禁绝。他接着还说“向之嘉、隆以来之学,得罪于圣教,得罪于国家,有君国子民莅官临政之志者,当摈而绝之,不可稍有入焉者也。”也就是说“摈而绝之”的,主要就是指阳明后学,其次则是诸如下文所论及的东林、蕺山、夏峰等明清之际著名的理学流派了。

为了进一步阐明朱、王二学之“不可调停”,以及朱学与王学其根本性的不同,陆陇其又提出必须明辨学术之源与流,也即明辨“立教之弊”与“末学之弊”。他说:

至论正、嘉风俗之坏,非姚江之过,学姚江者之过。此今日调停朱、王者,大抵如此立论,然仆则以为不可调停者。风俗之坏,实始姚江,非尽其徒之咎也。若徒归狱龙溪辈,而谓与姚江无干,则非惟不足以服龙溪,且将使天下学者,不见姚江之失,复从而学之,其害可胜道耶?大抵学术之弊,有自末流生者,有从立教之初起者。如学考亭不得,则流于腐,此自末流生者也。若姚江,则立教之初已诞矣,何待学之不得,而后流于诞?此不可同日而论也。(《答同年藏介子书》,《三鱼堂文集》卷五,《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129页)

当时就有人认为,正德、嘉靖时期风俗的败坏,以及王学的种种流弊,不是阳明本人的过失,而是学阳明的那些后学诸如王畿等人的过失。陆陇其认为不可将王学的流弊都归之于王畿,而是应该追究到王阳明本人。故在对当时“调停朱、王”者加以再批判之时,提出要区分学术之源与流,也即“立教之初起者”

与“末流生者”。再以此来看朱学与王学,那么朱学即使有弊病,也是因为后学不得其法,故为“末流生者”;而王学则是“立教之初”就有弊病,不必等到王门后学。所以说朱、王二学“不可同日而论”。对此问题,陆陇其在《学术辨》中则说得更为清楚:

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学之弊。末学之弊,如源清而流浊也;立教之弊,如源浊而流亦浊也。学程朱而偏执固滞,是末学之弊也。若夫阳明之所以为教,则其源先已病矣,是岂可徒咎末学哉!(《学术辨上》,《三鱼堂文集》卷二,《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27页)

陆陇其于是强调,必须区分“立教之弊”与“末学之弊”,末学之弊则如水的源头清澈而其末流则浑浊,程朱之学就是如此;立教之弊则如水的源头浑浊,那么末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清澈了,阳明之学就是如此。

陆陇其通过源与流的分辨,使得朱、王之“是非”更加明显了,他的这些分辨,就是为了反对明清之际诸如东林之顾宪成、高攀龙以及黄宗羲、孙奇逢等对阳明心学持有回护态度或持有朱、王调停态度的学者。最后,陆陇其留下的学术之正途只有一条了,也即“独尊”朱子学而已,无论王阳明本人或是王门的诸后学,乃至顾、高与黄、孙都当“深辟”,即便他们也“尊朱子”且是“君子”,也当“严辨”。

二

在陆陇其看来,明清之际尚有两类回护王阳明之学术者:“今之回护姚江者有二:一则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语,此不过欲宽姚江,其病犹小;一则以姚江之意解程、朱之语,此则直欲诬程、朱,其罪大。”(《三鱼堂剩言》卷八,《陆陇其全集》第十册,第85页)也就是说,诸如刘宗周等属于王学一系的学者,往往用程、朱之意思来解释王阳明的语录,以朱学修正王学,其影响主要在王学内部,故“罪小”;至于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则标明“宗朱”,属于程、朱一系的学者,然而对王学虽有批判但不彻底,甚至也有暗用王学的某些思想来解读程、朱语录的,这就是在混乱程、朱,诬陷程、朱,故“罪大”。他还说:“必使考亭、姚江如黑白之不同,勿有所谓停其间,则大指可得,而世道其庶几矣。”(《答秦定叟书又》,《三鱼堂文集》卷五,《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137页)朱学与王学,如“黑白之不同”,如“调停其间”则即便其“大指可得”,也对于“世道”意义不大,所以说陆陇其在清初倡导朱子学“独尊”,并未在“尊程朱黜阳明”议题上止步,而是进一步发展到了对“回护姚江”“调停其间”等学风的批判。

在两种回护、调停之中,陆陇其最为担心的是宗朱而又不够彻底,表面看似朱学,而实际仍旧未曾超出王学范围的东林之学。他对东林顾、高学术的得失,也即“阳尊而阴篡”的问题作了全面的辨析,下面则分四点来加以说明。

首先,就晚明学术而言,陆陇其认为东林学派最为近于“学术之正”,顾、高二人使得天下学者重新关注于程朱之学,且痛陈阳明之学的弊病,学风为之一变,这些功绩不可不加以肯定。“泾阳、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学者复寻程、朱之遗规,向之邪说诡行为之稍变。然至于本源之际,所谓阳尊而阴篡之者,犹未能尽绝之也。”(《学术辨上》,《三鱼堂文集》卷二,《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26页)顾、高二人起来振作学风,虽说批判王学亦可谓“深切著明”,“扶植纲常之念,真可与日月争光”(《答嘉善李子乔》,《三鱼堂文集》卷五,《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112页)。但还是不够彻底,特别是在“本源”上头依旧有着“阳尊而阴篡”,故不能算作真正的程朱之学。

其次,在《学术辨》之中,陆陇其曾围绕“本源地”问题,将顾、高之学与王学、朱学作了细致的比较:

泾阳、景逸深惩其弊,知夫知觉之非性,而无善无恶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击阳明者,亦可谓得其本矣。然其学也,专以静坐为主,则其所重仍在知觉,虽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当穷究,然既偏重于静,则穷之未必能尽其精微,而不免于过不及。是故以理为外,而欲以心笼罩之者,阳明之学也;以理为内,而欲以心笼罩之者,高、顾之学也。阳明之病,在认心为性;高、顾之病,在恶动求静。……夫静坐之说,虽程朱亦有之,不过欲使学者动静交养,无顷刻之离耳,非如高子《困学记》

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后有以为下手之地也。由是观之,则高、顾之学,虽箴砭阳明多切中其病,至于本源地仍不能出其范围。(《学术辨中》,《三鱼堂文集》卷二,《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29-30页)

顾、高虽然已经指出了王学的两大弊病“知觉之非性”与“无善无恶不可以言性”,但还是因为在工夫论上是“静坐为主”,于是其所重者依旧在知觉。陆陇其还指出,即使顾、高也强调“事物之理”的重要性,且认为“吾性所固有”也需要去穷究,然而就是因为偏重于“静”,所以他们的格致“事物之理”做不到精微,或过或不及。王阳明之学,讲的是“心即理”“心外无理”,其弊病在于“认心为性”;而高、顾之学,则讲的是“理为内”,理在“吾性”,还是以心笼罩理,也即以静坐的方式在心上做工夫,所以陆陇其认为东林之学并不是程朱正学。当然静坐之法,在程、朱那里也曾讲到,然而只是要学者注意“动静交养”,至于顾、高所讲的静坐,诸如高攀龙《困学记》所说的“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还是在走阳明学者的老路,甚至近于禅宗的路子。陆陇其还说:

我观高子之论学也,言一贯,则以为入门之学;言尽心,则以为尽心然后知性;言格物,则曰“知本之谓物格”。与程、朱之论往往龃龉而不合者,无他,盖欲以静坐为主,则凡先儒致知穷理、存心养性之法,不得不为之变易。(《学术辨中》,《三鱼堂文集》卷二,《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29页)

在他看来,高攀龙讲“一贯”则作为入门之学,讲“尽心”则作为“知性”的功夫,讲格物则强调“知本”等等,都与其“静坐为主”的修养工夫相关,其实还是偏向于内在证悟本体,而对致知穷理、存心养性等偏向于外在的践履工夫则不够重视,甚至变易得似是而非了。也就是说,高攀龙以静坐求得性体之证,乃是在心上求,故近于“心即理”,故于程、朱之“即物穷理”有“大异”,“又阅其《静坐说》,乃知高子所谓性体,亦是指心,亦大异于程、朱矣。”(《三鱼堂日记》卷七,《陆陇其全集》第十一册,第241页)所以说难免重蹈阳明学的覆辙。陆陇其也有直接指出高攀龙的“主静”与佛家的坐禅相近:

盖《乐记》之人生而静,《太极图》之主静,皆是指敬而言,无事之时,其心收敛不他适而已。非欲人谢却事物,专求之寂灭,如佛家之坐禅一般也。高景逸不知此,乃专力于静,甚至坐必七日,名为涵养大本,而不觉入于释氏之寂灭,亦异乎朱子所谓静矣。此用力于静者,所不可不知也。(《答秦定叟》,《三鱼堂文集》卷五,《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134页)

陆陇其认为《乐记》与《太极图》说的主静,其实都是指“敬”,也即收敛人心不使其放逸,并非“谢却人事,专求寂灭”,与佛家说的“坐禅”完全不是一回事。然而高攀龙治学所讲主静,所谓“坐必七日”的“涵养大本”之方法,则与佛家坐禅的讲求“寂灭”比较接近,也就与朱子的“动静交养”“敬该动静”则比较远了。所以,陆陇其认为高攀龙与陆九渊、王阳明、刘宗周都是“收拾精神一路功夫”,而高攀龙讲求的“主静”之学则“大体本于”罗洪先,因而难免近于佛禅外道。(《松阳钞存》卷下,《陆陇其全集》第十册,第310、152页)

再次,针对高攀龙对王学得失的辨析,陆陇其也作了详尽的辨析,指出其对王学的认识有误以及“辟王”的不彻底性:

余尝闻高子景逸之言曰:“姚江天挺豪杰,妙悟良知,一洗支离,其功甚伟,岂可不谓孔子之学?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昭昭矣。始也扫见闻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废学,于是乎诗、书、礼、乐轻而士鲜实悟;始也扫善恶以空念耳,究且任空念而废行,于是乎名节、忠义轻而士鲜实修。”斯言似乎深知阳明之病者,然余不能无疑焉。既曰非孔子之教,又可谓孔子之学乎?学与教有二道乎?阳明之所谓良知,即无善无不善之谓也。是佛、老之糟粕也,非孟子之良知也,何妙悟之有?支离之弊,正由见闻未广、善恶未明耳。扫见闻、扫善恶以洗之,支离愈甚矣,功安在乎?徒见其流之弊,而未察其源之谬。比之龙溪、海门之徒,挟阳明之波者,虽若有间,而圣人之道终未明也。(《王学质疑序》,《陆陇其全集》第二册,第254-255页)

高攀龙肯定王阳明“良知”之学,认为“一洗支离,其功甚伟”,他反对王阳明也有两点:不讲闻见之知只

讲明心,最终导致“任心而废学”,也就是说轻视了读书明理,也就难有实悟;讲求“无善无恶”,最终导致“任空念而废行”,轻视了名节忠义,也就难有实修。高攀龙还有为王学辩护的一面,他将孔子之学与孔子之教区分开来,说王学属于孔子之学,其学术还是正确的;但不符合孔子之教,其教人之法则有弊病。陆陇其则是一贯的严苛,他的辨析则可以分为四点:第一,认为学与教不可区分为二;第二,进一步分析,指出王阳明所说的良知讲求“无善无恶”,所以不是孟子所说的良知,所以“良知”之学谈不上什么“妙悟”,反而是佛、老之学的糟粕;第三,所谓的学术“支离”,陆王一系学者常常说朱学重闻见之学故而支离,陆陇其恰恰相反,认为正是闻见不广、善恶不明,所以才会支离,所以王阳明的学说只会导致更加支离,而何来“一洗支离”之功?第四,高攀龙未能顺其流之弊而探其源之谬,所以高攀龙之学虽然与王畿、周汝登之类不同,但还是不能有助于圣人之道之真正讲明。

最后,陆陇其曾在与友人的书信之中,专门指出高攀龙之学与朱子之学的不同之处:

而考其用力所在,质之紫阳,亦有不能无疑者。姑取高子书中数端言之,其《困学记》所谓“旅舍小楼,见六合皆心”者,朱子有此光景乎?其《行状》所谓“焚香兀坐,坐必七日”者,朱子有此功夫乎?其《遗疏》所谓“君恩未报,愿结来生”者,朱子有此等语乎?

又,朱子自云“平生精力,尽于《大学》”,而“格致”一章,则其教人起手之所在也。“良知”之家,所最不满于朱子者在此,景逸既尊朱子,而亦以《古本》为是,以不分经、传为是,以格物为知本,此何谓也?

又,阳明“无善无不善”之说,渊源告子,不知性之甚者也。景逸既深知其非矣,却又云“无善之说,不足以乱性,而足以乱教。”夫性与教,若是其二乎?既足乱教,而谓不足乱性,又何为也?此皆大纲所在,而相左如此,学者将何所取舍乎?(《答嘉善李子乔》,《三鱼堂文集》卷五,《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112页)

此段文字论述较为完备,其一,指出高攀龙之学诸如“旅舍小楼,见六合皆心”“焚香兀坐,坐必七日”,就修养工夫来说是以静坐为主,与王门后学中的某些学者类似,也与佛家的坐禅类似;而“君恩未报,愿结来生”则明显带有佛教的轮回思想,难怪刘宗周也对此有所批评而辨正了。^①其二,高攀龙既然标榜朱子,而朱子《四书》学用的是《大学》改本,且强调“格致”一章为“教人起手之所在”,王阳明最不满朱子也就在此处,故而主张用《大学》古本,淡化“格致”一章,也就是说《大学》的改本、古本之争是朱、王异同的标志,然而高攀龙“既尊朱子,而亦以古本为是”等等,则体现了在朱、王学术选择上的矛盾。其三,高攀龙“不足以乱性,而足以乱教”的说法,与上文将“孔子之学”与“孔子之教”区分其实是一贯的思路,在陆陇其看来,在辨析“无善无恶”说的时候,像高攀龙这样仅仅指出在“教法”上存在的问题还是不够的,要从“性学”的根本处入手,将“无善无恶”列为告子一系的异端,从而彻底驱逐出儒学的“道统”。

因此,陆陇其对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攀龙的评价就是虽然在“由王返朱”之路上有功,但学术都不纯正,非“朱学之正脉”,也“未能脱姚江之藩篱”(《答嘉善李子乔》,《三鱼堂文集》卷五,《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112页)。他还说:

景逸、泾阳,病痛尤多,其于阳明,虽毅然辟之,不少假借,然究其实,则有未能尽脱其藩篱者。

其所深恶于阳明者,无善无恶一语,而究其所谓善,仍不出虚寂一途。言有言无,名异实同。(《答徐健庵先生书》,《三鱼堂文集》卷五,《陆陇其全集》第一册,第122页)

顾宪成与高攀龙辟王不够彻底,留下了“不少假借”,即便是他们被后人评价最高的“无善无恶”之辨,也即保存于顾、高文集的二人,与管志道的著名论辩书信,在陆陇其看来仍就不出“虚寂一途”,也就是说顾、高反对“无善无恶”捉摸本体,然而他们自己的治学还有讲求虚无、寂灭之类近于禅学的一面,似乎也不过“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① 刘宗周《书高景逸先生帖后》,《刘宗周全集》第四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2-123页。

三

在两种回护、调停之中,陆陇其批评之另一方面,也就是“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语”,也就是如刘宗周之类学术主旨原本就偏向王学、又以朱学修正王学的学者。陆陇其考察了清初学界之后指出,当时持调停态度的主要有夏峰学派的开创者孙奇逢与蕺山学派的传人黄宗羲二人,他说:

阅孙征君年谱,叹近年来南方有一黄梨洲,北方有一孙钟元,皆是君子,然天下学者被他教得不清楚。(《三鱼堂剩言》卷八,《陆陇其全集》第十册,第83页)

黄宗羲、孙奇逢二人在道德践履上都做得不错,所以说他们都是君子,而且门人众多,一南一北影响都很大,但在学术上却主张调和于朱、王之间,所以说“天下学者被他教得不清楚”,于是陆陇其只得多加批评了。关于黄宗羲,他说:

黄太冲《学案序》述有明一代之儒者,可谓有功,而议论不无偏僻。盖以蕺山一家之言,而断诸儒之同异,自然如此。……若蕺山先生者,以为兴起之师则可,以为成德之师则不可,而太冲尊之太过,所以多费周旋。(《三鱼堂剩言》卷八,《陆陇其全集》第十册,第80页)

黄宗羲(太冲)是刘宗周的传人,故而陆陇其说他尊师太过,因为以刘宗周一家的学术史观编撰《明儒学案》,臧否有明一代学人,虽然有功但是议论却难免有所偏僻之处。此处所谓“偏僻”具体指什么没有明说,据理推测则当是因为整部《明儒学案》以王学的发展为中心,且对王阳明以及多数王门后学都有较高的评价,只对泰州王门等少数有所批评。刘宗周及其蕺山学派还是属于王学一系,刘宗周虽然对王学有所辩难,但还是未脱离王学,只能说以朱学来加以调停而已。陆陇其认为从学术上说,刘宗周只能称为兴起之师,对王门后学流弊的救治远远没有完成,所以还不能称为“成德之师”。此处所谓“周旋”就是在说黄宗羲因为尊崇其师刘宗周,故而调停于朱、王二系之间。另外在陆陇其的日记之中,还有以朱学批评黄宗羲的记载:

太冲《与姜定庵书》云“致知之知,乃澄然未发之体……吾之所致者,在澄然之体,由澄然而发见,发见者,无所容吾致也。”噫!如此说,则朱子“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一语,如何解乎?(《三鱼堂日记》卷六,《陆陇其全集》第十一册,第218页)

黄宗羲对于致知的解释也偏向王学,故而讲求捉摸未发之体,这也是陆陇其所不能认同的,因为朱子讲致知重在已发,在已发之中辨明其理。关于孙奇逢,陆陇其称赞其人品值高,堪称“一代伟人”,但为学则“不虚心、不细心”(《三鱼堂日记》卷九,《陆陇其全集》第十一册,第310页)。正好孙奇逢也著有学术史的著作《理学宗传》,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一样对王学有所回护,主张程、朱、陆、王皆收,且象山、阳明后学也有附上,故陆陇其对此书大为不满。他说:

容城孙奇逢《理学宗传》一书,混朱、陆、阳明而一之,盖未知考正晚年定论也。但慈湖、龙溪、近溪、海门则列在末卷《补遗》之中,盖亦知其非矣。(《三鱼堂剩言》卷七,《陆陇其全集》第十册,第70-71页)

在《理学宗传》卷二十六《王龙溪畿》之中,孙奇逢说“龙溪独持四无之说……于是龙溪之言满天下,后传龙溪之学者流弊滋甚,因是遂疵阳明之学。嗟乎!岂阳明之过哉?亦由于传阳明者之过耳!”(《理学宗传》卷二十六,《孙奇逢集》上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45页)也就是说,孙奇逢认为王畿“四无”说有过错,然而其过错在于传承王学的王畿,而不在于创立王学的王阳明。将王阳明与王门后学加以区分,持有这种态度的人极多,然而陆陇其却认为这种态度就是调停朱、王,故而极力反对:

大抵昔之为王学者,乐其病;今之为王学者,掩其病。

姚江一派学术,日异而月不同。正、嘉之际其词诡,嘉、隆之际其词淫,万历以后其词邪,至今日其词遁。(《三鱼堂剩言》卷八,《陆陇其全集》第十册,第84、85页)

在他看来,晚明之时从事王学的直接表现为喜好王学的那些弊端,到了清初之时从事王学的不敢明目张

胆,则表现为掩饰王学的弊端,所谓“今日其词遁”,也就是指调停、回护之类。

此外,需要补充的还有两点。一是陆陇其还将陆世仪归入东林一路,由此来提出批评“桴亭极尊程、朱,而亦不敢深辟象山、阳明,盖亦梁谿之派也。”(《问学录》卷四,《陆陇其全集》第十册,第247页)另一是关于“主静”以及心性之辨,陆陇其曾将高攀龙与刘宗周一并讨论:

大约自罗整庵痛言象山、阳明之后,如高景逸、刘念台,皆不敢复指心为性。但心性之辨虽明,亦不过谓心为气,而性为理,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即心云尔。其欲专守夫心,以笼罩夫理则一也,特阳明则视理在心外,高、刘则视理在心内,高则以静坐为主,刘则以慎独为主。而谓无动无静,高则似周子主静之说,刘则似程子定性之说,及朱子中和初说,而皆失其真。(《三鱼堂剩言》卷七,《陆陇其全集》第十册,第72页)

高攀龙与刘宗周(念台)都不敢直接“指心为性”,认为“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即心”,但还是像王阳明一样,守着“心以笼罩夫理”与“理在心内”等观点,高攀龙的“静坐”等学说近似周敦颐;刘宗周的“慎独”等学说则近似程颢《定性书》、朱子“中和初说”,这些在陆陇其看来则都不是朱子集大成之后的定论,所以高、刘之学“皆失其真”,不是正学。

四

“由王返朱”本是弥漫于清初的时代风气,在民间学者那里发端,而在官方则又将之意识形态化了。陆陇其之所以提出“独尊朱子”且“辟王”特别严苛,乃是受到了张履祥、吕留良这两位民间学者的直接影响,也与熊赐履等官方学者的影响,以及康熙帝对朱子的推崇有一定的关系,他自己也说“今天子敦崇正学,程、朱之说复行于世。”(《周永瞻先生四书断序》,《三鱼堂文集》卷八,《陆陇其全集》第二册,第246页)若一定要说,通过陆陇其的努力,将民间学者的“尊朱辟王”思想“收编”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也不为过,然而他毕竟还是出于学术选择的自觉。

至于是否如当时有些学者所指摘的,亦出于“门户之见”,方才显得过于严苛,则似乎也不可简单论定。陆陇其的后学张履(1792-1851)为其日记作序时说“公确守程、朱,其贬斥阳明及论梁谿、戴山之偏,或颇以为过,然理之至当,不容有二。是非同异之界,辨之必明,而持之必力,乃公卫道之志,则然非有门户之见存也。”(《三鱼堂日记序》,《三鱼堂日记》卷首,《陆陇其全集》第十一册,第5页)张履为陆陇其辩护,认为至当之理必然只有一种,就必须在“是非同异之界”明辨之,可说“卫道之心”然不可说“门户之见”。后人还有评价说“程、朱之统,自明薛敬轩、胡敬斋后,惟陆陇其能得其正宗。”^①“有宋之朱子,即有今之陆先生也,与先生同时诸儒,以及后之继起者,间多不及先生之纯。”^②这些身后定论,则恐怕是陆陇其所最希望得到的了。

梁启超曾说陆陇其“不惟攻击陆王,乃至高景逸、顾泾阳学风介在朱王之间者,也不肯饶恕”^③,确实,在清初学术史上,陆陇其就是以“卫道”而著称的学者。从其时代来看,则对顾、高与黄、孙等明清之际学者的深辟与严辨,维护学术的纯正性也是有必要的,从而将朱子学更多地引向道德践履一途,则也是有意义的。到了雍正朝,陆陇其成为清代本朝第一个从祀孔庙的儒者,也是因为其《学术辨》等著作之中的“独尊朱子”论,对于朱子学的繁荣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学院)

责任编辑:高海波

① 章棫《康熙政要》卷四《任贤》下,光绪刊本,第22页。

② 唐鉴《清学案小识》,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页。

③ 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九章,《梁启超全集》第十二集,第400页。